试论清军甲午战败的军事原因

张一文

This paper provides a comprehensive analysis from the angle of military strategy of the fundamental factors contributing to the defeat of the Chinese armed forces in the Sino-Japanese War. The immediate cause of defeat should be sought in the illusions about peace cherished by Li Hongzhang and his delay in preparing for war when confronted with steady Japanese pressure. This delay resulted in China's armed forces being thrown into a state of passivity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of the campaign. After the declaration of war on Japan, the Qing court failed to formulate a total strategy of army-navy coordination. The Beiyang Fleet remained inactive, failing to bring its forces into full play, while the army concentrated its forces on the northern flank, leaving Lushu and Weihaiwei with a shortage of defense forces. Moreover, the Qing defense system had become obsolete. Its armed forces lacked a sound general staff and logistics system and the professional quality of officers and men was at a low level. The above-mentioned factors, taken together, contributed to the disastrous defeat suffered by the Qing forces in the war.

19世纪中叶以前，中日两国同为闭关锁国的封建国家。19世纪中叶以后，两国的国门差不多同时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所打开，并从此开始走上了学习西方的富国强兵之路。可是，仅仅过去二三十年，日本竟走上了向外扩张侵略的军国主义道路，悍然对中国发动了震撼远东的甲午战争，并使清军遭到了惨败。为什么拥有四亿多人口和近百万常备军的大清帝国，在"蕞尔小邦"日本数万军队进攻之下竟"战无一胜"呢？本文试图从军事的角度具体分析清军遭致惨败的基本原因。

一、国防发展战略的失误是甲午战败的首要原因

清王朝经过两次鸦片战争失败后，已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增强国防的愿望。清王朝发展海军的目的，当然是为了抵御外来侵略，其主要的目的是防御日本。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说过："泰西虽强，尚在万里之外，日本则近在户闼，伺我虚实，诚为中国大患。"②又说："日本狡焉思逞，更甚于西洋诸国，今之所以谋水师不遗余力者，大半为制驭日本起见"。③诚然，清王朝在创建近代海军方面作了很大努力，尤其是1874年日军入侵台湾之后，更引起朝野对日本的警觉，增强了建设近代海军的迫切感，并制定了优先发展北洋海军的方针。因此，此后十余年间，积极创设造船厂，向西方购买舰船，构筑旅顺口、威海卫等海军基地，开办各类水师学堂。1885年在京城设立海军衙门，1888年宣告北洋海军正式成军，在海防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进步。然而，日本也并未睡大觉。它针对北洋海军的筹建，先后拟订了第六、七、八次扩充海

军的计划，每年以财政收入的四分之一作军费，并连年发行海军公债，终于在1894年前建成了一支较北洋海军更为精锐的舰队，其主要船只由于下水时间较晚，因而航速更快，安炮更多，其性能较北洋舰队的主要舰只为优，其中所谓"三景舰"，即"松岛"、"严岛"、"桥立"，公开提出要具有足以穿透北洋舰队"定远"和"镇远"舰装甲的火力。

就在这中日双方竞相压过对方的关键时刻，清廷主政者以北洋舰队成军为满足，停止了继续发展的步伐，自1888年至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的7年间，再未购买过一艘军舰；1891年户部决定两年内停止向外洋购买枪炮、船只及器械，致使整个国防建设完全处于停滞状态。清王朝这一国防发展战略上的失误，李鸿章在战前已有所察觉。他在1894年5月第二次校阅海军后向朝廷的奏报中说："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亦能节省经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④李鸿章的担心并不是多余的，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战败，舰只性能相对落后，是一个重要原因。

甲午战前清王朝在国防发展战略方面的失误，并不仅限于海军方面。应该说，在陆军和整个国防体制的改革方面反映得更为明显。自19世纪60年代中期以后的近30年中，八旗、绿营固已腐朽不堪，即使在部分绿营按照勇营制度改编的"练军"，以及部分湘淮军实行经制化的"防军"之中，除了采用洋枪、洋炮和改练洋操以外，并未进行过什么改革。只有李鸿章控制的分驻于渤海沿岸的数十营淮系防军，略具某些国防军的性质。至于国防体制，除了于1885年成立了试图经管全国海军事务的海军衙门外，其余一概无甚改变。

而在同一时期，日本陆军却基本完成了实行近代化的改革。早在19世纪70年代初，日本就颁布征兵令，用义务兵役制取代武士职业兵役制，并开始建立起拥有现役和预备役的近代常备军。1878年，日本政府陆军省参谋局，脱离政府自隶天皇，扩大为独立的参谋本部。1883年，日本建立第一所陆军大学。1888年，陆军将原来的镇台制，改行野战师团制。进入90年代，每年都举行有二三万官兵参加的陆军大演习或海陆军联合大演习。1893年，颁布了《战时大本营条例》，成立了由天皇直接领导的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总之，日本的战争机器已全盘近代化了。

因此可以认为，清王朝在陆军改革以及整个国防体制改革方面的严重滞后，其给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决不亚于海军发展方面延误。正是清王朝在国防发展战略方面的上述种种贻误，为清军在甲午战争中战败埋下了祸根。

二、战备工作的迟缓
使战局从一开始就陷于被动

1894年春，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廷应朝鲜政府的请求，派兵入朝协助弹压。日本便以此为借口，大举派兵入朝，迅速占领了仁川、汉城等战略要地；海军舰队也开至朝鲜海面，控制釜山，仁川等海港，为挑起战争作准备。

从6月12日日本先遣队在仁川登陆到7月25日丰岛海战爆发的一个半月之内，赴朝日军增至万人，其蓄意扩大事态、挑起战争的企图已十分明显。然李鸿章思想麻痹，一误再误。首先，日方顽固地拒绝了清方提出的两国同时自朝撤军的合理主张，其蓄意挑起战端的野心已可

窥见。其次，当日方节外生枝地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继续大量向朝增兵时，驻日大使汪凤藻、驻朝商务大臣袁世凯也建议向朝增兵，李鸿章则强调“倭廷欲以重兵胁议韩善后，并非与我图战”⑤、“若我再添兵厚集，适启其狡逞之谋”⑥，拒不向朝鲜增兵。甚至当总理衙门提出：“倭如添兵未已，我应否多拨以助声势，望审筹酌办”⑦时，李鸿章仍不顾严峻的形势，回电说：“我再多调，日亦必添调，将作何收场耶？”⑧仍一厢情愿地想避免战争。

李鸿章拒不进行备战，还寄希望于西方列强出面调解。尤其当俄表示要用“压服”的办法“勒令（日）与中国商同撤兵”之后，更增加其求和的幻想。直到丰岛海战前三天，李鸿章还幻想俄方直接参战，他致电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说：“将来俄拟派兵船，届时或令汝随同观战”⑨。

李鸿章之所以迟迟不作战备，还在于他迷信“万国公法”。他认为：“两国交涉，全论理之曲直，非恃强所能了事”⑩又说：“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彼谅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绌”⑪。他似乎不懂得，谈判交涉应以军事实力为后盾，增兵备战非但不影响谈判，而且有利于谈判；军事准备得越充分，对谈判交涉越有利，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就更大。

7 月初，赴朝日军已愈万人，这时李鸿章才认识到日军“恐非空言所能勒退”，开始考虑抽调部队，增援朝鲜。14 日，朝廷决定“大举致讨”，他才被迫决定选派卫汝贵、马玉昆、左宝贵等率兵万余，取道陆路，增援汉城；同时决定从北塘抽调 1500 人，取道海路，增援牙山。此时开战在即，李鸿章以区区 1500 人增援牙山绝地，非但于大局无补，反而加重了驻牙山清军的负担，实属不智之举。

7 月 21 日，赴朝清军取道海陆，分头出发。25 日，由方伯谦率领的“济远”、“广乙”及运兵船“高升”号在朝鲜牙山口外半岛海面遭日海军第一游击队袭击，“广乙”搁浅自焚；“操江”被俘，“高升”连同船上近千名将士被击沉。日方蓄谋已久的中日战争终于爆发。

李鸿章企图以和平手段谋求和平，终于未能避免战争。由于幻想和平，清方对朝鲜战争发展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全然没有分析判断，更没有制订各种应急方案。至于战争如果打到中国本土后又怎么办，他们既未想过，更谈不上进行了什么切实的战备工作。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公使田贝所说：“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而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⑫清方正由于在战前未作好充分的战备工作，故战事从一开始就陷了被动，从而给战争的结局播下了失败的种子。

三、战略谋划不善
使战局节节失利

战略是谋划、指导战争的方略，是作战指导的灵魂。丰岛海战后，清王朝被迫于 1894 年 8 月 1 日对日宣战。光绪帝发布谕旨，宣示中外。其中写道：“倭人渝盟肇衅，无理已极，势难再予姑容。著李鸿章严饬派出各军，迅速进剿，厚集雄师，陆续进发，以拯韩民的涂炭。并著沿江沿海各将军督抚及统兵大臣，整饬戎行，遇有倭人输船入各口，即行迎头痛击，悉数歼除，勿得稍有退缩，致于罪戾。”⑬有的论者认为，此段文字就是清廷关于整个甲午战争的战略方针。笔者认为，此段文字只是政治性宣言，并不具有为整个甲午战争规定战略方针的性质。因为它只讲到了朝鲜，根本未涉及在本土作战的问题；只讲到了陆军，并未涉及海军作战问题。因此，它充其量只是关于清军赴朝作战期间的作战方针。

1894 年 9 月中旬，清朝陆军在平壤战败，北洋舰队在黄海海战中受重创，标志着中日双方军队在朝鲜作战的基本结束，战事进入第二阶段，战场开始移向中国本土。9 月 19 日，李鸿章

向朝廷上了一篇《据实陈奏军情折》，其中提出："伏愿圣明在上主持大计，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巨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⑭这是李鸿章根据多年来对日本的了解，并深入分析研究了中日双方力量对比，以及各自国情的特点，而提出的关于战胜日本的总设想、总方针，内容涉及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领域，其中包含有难能可贵的持久战思想，对于弱的大国如何战胜强的小国具有普遍意义。不过，在当时的情况下，要清王朝接受并做到上述诸方面的要求，则是不现实、不可能的。因此，李鸿章的这些正确主张，只具有思想资料的价值，不可能对正在进行的甲午战争，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就在同一份奏折中，李鸿章还就当前的战略方针提出自己的主张。他说："就目前事势而论，惟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以为规复朝鲜之地。"⑮这就是日军行将侵入中国本土时的清军作战方针。究竟应如何评价这个方针呢？京畿是清王朝的统治中心，严防力保当然是必要的；但与此同时，李鸿章为了保住清王朝祖宗的陵寝所在地，又"力保沈阳"，这就出现了两个保卫中心。备多力分，这在战略上就分散了兵力与注意力，于战局十分有害。事实也正是这样，当进军朝鲜之际，李鸿章即从旅顺调兵力；后来增防鸭绿江前线，又从旅顺抽调兵力，甚至连守将宋庆也被调走，致使旅顺防御空虚，听凭日军在花园口登陆。后来虽从外地添调和临时招募了一些部队应敌，终因兵新力单，大连、旅顺先后陷敌，北洋舰队不得不退避威海，渤海门户遂不可恃。

正当旅顺吃紧之际，清廷非但未能加强威海方向的防务，反从山东抽调章高元部 8 营援救旅顺，致使山东防御力量也受到削弱。虽然连光绪帝也感觉到"旅顺既为倭踞，现又图犯威海，意在毁我战舰，占我船坞，彼之水师乃可往来无忌，其谋甚狡"。⑯然而也未采取任何有力的对策和措施来改变这种危险处境。在日军海陆夹攻下，威海于 1895 年 2 月 2 日陷落，北洋舰队随之全军覆灭，渤海门户为之洞开。

旅顺、威海相继失陷，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京畿遂暴露在日军进攻的兵锋之下。回顾甲午战争的全过程，清军北不坚守旅顺，南不坚守威海，而将主要兵力集结于辽河平原，这种战略重次的颠倒，导致战局的急转直下。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战备工作迟缓，又缺乏战略预备队，临战拆东补西，顾此失彼；二是对实行陆海协同始终缺乏认识，故对旅顺、威海的防御未能摆上战略位置。因而"严防渤海"的战略方针，实际上成了一句空话。这是甲午战争中战略指导上的一大失误。

四、海军使用不当是
甲午战败的又一重要原因

北洋海军是清廷惨淡经营多年的一个近代军种，也是清廷手中唯一能对敌构成威胁的战略打击力量，它能否在保卫海疆中发挥作用，对战争全局关系甚大。当时，中日两国海军力量的对比，日方在航速、速射炮方面占有优势，而清方则在装甲和大炮口径方面占有优势。就总体而言，日方略占上风。不过，如将日舰队远离本土，北洋舰队近靠基地等条件考虑进去，这种优劣之势又会受到一定的减杀。因此，中日海军间的较量，谁都不具有必胜或必败的概率。在这种情况下，清方只要指挥得当，完全有可能进行胜利的作战。但李鸿章、李汝昌等被这种相对的劣势所吓倒，完全丧失了战斗意志和胜利信念，对北洋海军作了一系列错误的作战指导。

丰岛海战前夕，丁汝昌本准备统率北洋舰队大队前往牙山一带巡航，行前致电说："大队到彼，倭必开仗，白日唯有力拼，倘夜间暗算，猝不及防，只听天意。"⑰流露出严重的畏敌怯战情绪。李鸿章接报后，非常生气，批评他"人有七分怕鬼，"一气之下，遂取消了这次舰队出巡行动。其实北洋舰队对日本舰队也有很大的威胁，据说"日本之畏定、镇二船甚于虎豹。"此次北洋舰队若按计划出巡朝鲜海面，非但在丰岛海战中不至于吃亏，而且还有机会重创日本海军。然而，由于李鸿章的轻率决策，这个战机被错过了。

中日正式宣战后，清廷和李鸿章给北洋舰队规定了一条远巡黄海，速去速回，聚泊严备，力保坚船的作战方针。若以当时双方海军实力而论，这个方针基本上是正确的，只是积极进攻精神显得不够而已。在这方针指导下，北洋舰队于7月27～8月12日的半月间，曾三次到朝鲜海面巡弋，只是未曾发现日舰，无功而返。

但8月10日，日本联合舰队对威海进行了一次袭扰，引起了清廷和李鸿章的震惊，于是下令正在出航的丁汝昌带全队回防。自此之后，清廷和李鸿章规定北洋舰队只在旅顺、威海一线巡航，严扼渤海门户，不得远离。这样一来，黄海的制海权遂拱手让予日本。北洋舰队若于此期间至朝鲜海面巡弋，寻机作战，乘敌航渡或半渡之际袭击日之运兵船，将有较大的取胜把握。可惜，北洋舰队自8月中旬起即停止出巡。

9月17日，北洋舰队在从大东沟返回途中与日舰队遭遇，发生了黄海海战。北洋舰队虽遭到沉毁5艘、伤4艘的重大损失，但主力舰"定远"、"镇远"尚在，对敌仍能构成威胁。可是，自此之后，丁汝昌以修舰为由，更加不敢出巡。10月24日，日海军护送第二军在辽东半岛花园口登陆，清方在半月前就获有情报，但在长达十余天的登陆期间，北洋舰队龟缩港内，毫无作为，又丧失了一次进击日军的机会。

旅顺失守后，威海成了北洋舰队的唯一栖息之所。这时，李鸿章给北洋舰队的指导方针是："有警时，丁提督应率船出傍台炮线内合击，不得出大洋浪战，致有损失。"⑱所谓"傍台炮线内合击"，看起来似乎含有水陆协同之意，然炮台只有港口才有，他处则无，故其实质是死守港口。海军的特殊功能在于它的机动作战，若只令株守港内，则与要塞炮无异，即失却其本身存在的价值。丁汝昌等经过研究，提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即"倘倭只令数船犯威，我军船艇可出口迎击；如彼船大队全来，则我军船艇均令起锚出港，分布东西两口，在炮台炮线水雷之界，与炮台合力抵御，相机雕剿，俾免敌船闯进口内，即使陆路包抄南北两岸，师船当可支撑攻击彼船；若两岸全失，台上之炮为敌用，则我军师船与刘公岛陆军，惟有誓死拚战，船沉人尽而已。"⑲这一作战方案，虽然设想了三种情况，然对狡猾的日军来说，第一、二种情况是不会出现的，故其实质也是死守港口。此后，朝廷一再要求率队出海拚战，丁汝昌最终也未敢率队出击。处在当时的情况下应如何击敌，署两江总督张之洞的建议具有积极意义。他说：北洋舰队应"就现在铁舰快船四五号，疾驶至成山头一带，顷刻可到，袭其运兵运械接济船及游弋之船，得到则进。如彼大队来追，则收至威海船台相依，倭必受伤。……或虑战败船毁，不知威海若失，海军已无老营，寥寥数舰，然后贼从容图攻，终归不支。趁此时威海炮台未失，赶紧用之，犹有万一之望。"⑳这个建议操作起来虽未必如此简单，但其精髓在敢于寻机出击，比之株守威海、坐以待毙，确要胜出一筹。可惜，李鸿章、丁汝昌对此毫无反应。日军在荣成登陆后，水陆夹攻威海，北洋舰队遂全军覆没。

养兵千日，用在一时，以北洋海军这样一支近代化舰队，在抗击外敌入侵的战斗中，完全可能发挥更大的作用。然在错误作战方针指导下，除了在黄海遭遇战中曾击伤过数艘敌舰外，最

终也未能击沉击毁过一艘敌船，甚至连一次主动出击的战斗也未曾有过。设想北洋海军的指挥者从战争一开始就有“船沉人尽”、与敌决一死战的精神准备，统率全舰队官兵，积极备战，寻机击敌，定能在消灭敌军、保卫海疆方面建功立业。可惜，李鸿章、丁汝昌等似乎不懂得，在与敌人交战的状态下，若要保存自己，就先要消灭敌人，若要保全北洋舰队，就要尽可能多地歼灭敌之舰艇。幻想在不消灭敌之舰艇的情况下保存自己，是万万办不到的。这就是北洋舰队全军覆没留给后人的血的教训。

五、军事素质低下
导致甲午战争每战皆败

军事素质低下也是导致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清军兵勇的素质低下是众所周知的。当时美国驻华副领事毕德格就曾说过："中国素不以与外国战争为事，其兵皆散布各省，由各督抚主政，兵部堂官并无调度会合之权。兵散则力分，故不能与外国争锋。日本改用西法，陆军、海军皆归部臣节制，故能通力合作，积健为雄。此中（国）东（日本）之所以异也。"㉑清朝兵勇或长期驻防，从未见仗；或从他省临时抽调，放下冷兵器，拿起洋枪炮；甚或临时招募，未及训练即开赴战场，其军事素质之差，可以想见。

中下级军官大多出身行伍，文化水平很低，未经正规培训，近代军事知识十分贫乏，不会带兵打仗。北塘的防军是直属北洋的淮军主力，即使这样，其所"添募之兵大率游手羸弱，不能施放枪炮，且额亦不充，自总兵吴育仁及营官初发祥外，鲜有知兵能教战之人。"㉒北塘尚且如此，其他部队的官兵素质更可想见。这样的乌合之众，怎能战胜敌人呢？

清军高级军官的情况也并不稍好。这些人大多出身行伍，早年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发迹。清军没有培养高级军官的学校，他们均未经过专门训练，除了象聂士成等少数将领有较多近代军事知识外，大多知识陈旧，年龄老化，基本上依旧袭用镇压农民起义时的一套旧战法，进攻时以密集队形冲击，防御时依赖一线火力拦截，守城时墨守城垣，附廓而屯，当然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清军将领尤其缺乏指挥大兵团作战的经验，平壤守将叶志超等，株守孤城，不布远势，坐待敌军来攻，当其后路受到威胁时，更全线溃退。宋庆守辽东，本有鸭绿江天堑可资凭借，然防御没有纵深，手中不掌握预备队，故一处被敌突破便全线溃决。日军在花园口登陆，事先获有情报，前后持续十余天，本应乘敌立足未稳之时给予打击，然李鸿章非但未组织部队进行抗登陆作战，反而下令不许清军抗击日军。他命令当地驻军"速即严防，于来路要口，多置旱雷，散队埋伏，多方以误之，勿轻与接仗为要。"㉓自此错失了歼敌良机。尤其对孤军冒进的海城日军，清军曾集中了数倍于敌的兵力，先后组织实施了5次反攻作战，也未能收复海战，可见清军指挥能力和战斗力的低下。

比较而言，由于海军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近代兵种，其军官大多经过培养训练，其中有的还经过英国、德国海军学院的深造，具有较高的近代军事知识。但北洋海军提督丁汝昌从未经过与其职务相适应的高级军事训练。他"出身行伍，未涉海军门径，凡关操练及整顿事宜，悉委（刘）步蟾主持。"㉔丰岛海战前他奉命率舰队巡航朝鲜海面，竟弄错了牙山的地理位置，受到李鸿章的训斥。甲午战争爆发后，从未见制订过海军作战预案，致黄海海战开始不久舰队就中断指挥，致遭重创。黄海海战后，他更是株守港内，任凭敌军登陆而无所作为。最后北洋舰队全军覆没，丁汝昌是难辞其咎的。

李鸿章实际上是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战略指挥员。但事实表明，他也是一个不称职的战略指挥员。他在处理和与战的关系上，一厢情愿地企求和平，迟迟不作战争准备，不懂得能战方能言和的道理；他在处理海军与陆军的关系上，缺乏海陆协同的概念，不懂得发挥海陆军联合作战的整体威力，从未组织过一次海陆协同的作战行动；他在处理战场南翼与北翼的关系上，重北翼轻南翼，导致了战略重次的颠倒；他在处理海军攻与守的关系上，实行消极防御，避战保船，不懂得只有消灭敌人才能最终保存自己的道理；他在处理上一战略阶段与下一战略阶段的关系问题上，往往只顾眼前，不顾长远，拆东补西，挖内补疮，缺乏照顾全局的战略头脑。总之，李鸿章在军事思想方面所存在的片面性、表面性和落后性，导致了在战略决策与指挥方面的一系列失误。因此，清军甲午战败，他要负首要责任。

六、国防体制落后
是甲午战败的深层原因

甲午战争时期的清朝国防体制，基本保持着鸦片战争以前的状况，中央军事决策指挥机构很不健全，指挥关系极不顺畅，远远不能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皇帝为最高统帅，享有军事上最高决策权，但办事机构极不健全。军机处并非专门的参谋机构，内阁中虽设有兵部，但仅仅管理绿营兵籍和武职升转之事，并不具有后来国防部的职能。虽新设了海军衙门，未见在甲午战争中有何作为，而对全国四支舰队也未能实行统一的指挥。黄海海战失利后，清廷曾一再要求从南洋调舰充实北洋舰队，但由于南洋大臣的拒绝而未能执行。战争中期成立的督办军务处，性质不明，职司不清，一时难以发挥作用。

甲午战争之初，军事、外交等统由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手经理。对上通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向皇帝报告情况，领受指令，层层转递，极不便捷。李鸿章负有相当于"前敌指挥"的责任，但北洋大臣衙门难以起到战时司令部的作用。李鸿章身为北洋大臣，直隶、旅顺、威海为其辖区，此外则概无指挥调度之权，有事尚需提请中枢批准，转达；而战时事务冗繁，时间紧迫，反复展转，贻误时机。这样复杂、蹩扭的军事指挥体制，根本不能适应近代化战争的要求。

甲午战争时期的清军，无论是八旗、绿营，抑或练军、防军，其主要职能是对内弹压各地人民起义，尚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国防军。八旗绿营固然早已腐朽不堪，不能作战，就是防军、练军，其营制仍是因袭早期湘军的营制，以营为基本作战单位，营以上再无确定的建制，平时星散各地，互不统属，战时凑合一处，难以发挥有机战斗集体的作用，以致在平壤出现了四位统将并列，旅顺出现六位统将并列的有将无帅的奇怪现象。即使于平壤临战前委任叶志超为总统，一时也难以起到统一指挥的作用。

陆军在兵种构成上，只有步兵和马队，没有炮兵、工兵、辎重兵的建制，难以适应近代作战的需要。而日军采用军、师、旅、联队、大队、中队、小队的编制序列，和步、骑、炮、工、辎混合编组的建制，显然具有很多优越性。

清军也没有建立起统一的后勤制度。由于防军、练军带有很大的私属性，粮饷均由各省自筹，若调往前线，后勤供应就更加复杂艰难。军械也由各省自筹，制式冗杂，规格不一，给枪械的管理和弹药的供应带来很大困难。

在兵员来源上，清军仍实行世兵制和募兵制，政治、文化、身体素质均难以保证。没有建立起预备役、后备役制度，平时养兵不少，战时又不够用。临时招募，形同乌合，兵痞流氓，转展应

募，开到前线，望风即溃。这样的队伍怎能敌得过训练有素的日军呢？

清军全国拥有90万军队，在总兵力上对日本全国近20万军队占有很大优势。但由于清军军制落后，调集起来十分艰难，仍感兵力不敷，在战场兵力对比上每每处于劣势。如在平壤，清军兵力为1.3万，而日军则达1.6万；在鸭绿江防线，清军兵力为3.04万，而日军也为3万人；在旅顺，清军1.47万人，而日军则达2.5万人；在威海，清军2.1万人，而日军则有2.5万人。清朝全国拥有90万军队，又在本土作战，然调集速度缓慢，在战场兵力对比上每每处于劣势。兵力数量上处于劣势的清军，要对优势日军取得战斗、战役的胜利，确实是很困难的。

综上所述，清军在战前既有国防发展战略上的失误和战备工作的迟缓，战争过程中战略上又谋划不善，再加军队素质低下和国防体制落后，终于导致了甲午战争"战无一胜"的惨败。以上六个方面所存在的问题，它表明在战争的各个重要环节上，清军都存在着严重的失误或缺陷。这六个方面所反映出的问题，正是清王朝政治腐败在军事上的具体表现。为什么差不多同时起步进行改革的中国和日本，其结局竟有如此大的差异呢？究其原因，在于清王朝所推行的改革，仅仅局限于从外国引进机器和技术，而对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则根本没有触动。这种畸形的改革方针反映在军事上，就是只买军舰、枪炮和机器设备，而对旧的国防体制、军事制度、指挥体系、军官培训任用制度，以及旧的军事思想一概不予触动。这种严重滞后的"上层建筑"，使近代化的武器装备不能发挥它应有的效用，以致在实战中"战无一胜"。由此可见，清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完全不是偶然的。

---

①《光绪朝东华录》，总3595页。
②李鸿章：《筹办铁甲兼请遣使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十九。
③李鸿章：《论覆梅启照条陈折》，《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十九。
④《李鸿章奏校阅海军事竣折》，《清末海军史料》（上）第283页。
⑤、⑥《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709、706页。
⑦⑧仝上，第718页。
⑨、⑩、⑪仝上，第805、760、794页。
⑫美国驻华公使田贝给美国国务院的秘密报告（1894年11月）。
⑬《光绪朝东华录》（三）第3441页。
⑭、⑮《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七十八，第62页。
⑯《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345页。
⑰《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804页。
⑱、⑲、⑳、㉑《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219、348、388—389、175页。
㉒《李鸿章全集·电稿二》第1049页。
㉓《李鸿章全集·电稿三》第79页。
㉔《陈兆锵所记中日战役情形》，《清末海军史料》（上）第349页。